



## 证据中介, Kerry Albright

是一位永远保持好奇心的国际公职人员，激发对知证决策和系统思考的热情，并帮助了解证据对国际发展的价值

我想对我们在使用证据解决社会挑战方面共同取得的多次成功表示庆祝，无论是在COVID-19大流行之前还是疫情期间，并鼓励我们所有人现在加倍努力，将目前进展顺利的事情制度化，并在其他领域做出改进。在过去的五年里，我们在联合国系统的不同部分取得了长足的进步，但在支持成员国政府政策制定者和其他决策者使用证据、在联合国规范性指南和技术支持中使用证据，以及充分利用与全球公共产品生产者的伙伴关系方面，我们还有很长的路要走，这是第五章和第六章中众多部分的主题。

在证据提供方面，我们需要认识到两点。首先，研究人员在促进单一研究（通常是他们自己的研究，影响的案例研究通常与增加的大学资金相关）和促进证据体系（包括“竞争对手”的工作）之间存在矛盾。正如我们在**第22和23条建议**中所述，我们需要重新审视学术机构和期刊创造的激励措施，以确保未来我们支持对证据体和开放科学的关注。其次，对于证据中介来说，在区分不同形式的证据和寻找能够捕获更全面方法的语言之间存在矛盾。在联合国儿童基金会（UNICEF），我们越来越多地使用实施研究的定义，该定义涉及由决策者共同领导的证据生成和使用，并融入决策的所有步骤（不仅仅是**第4.2节**中的步骤3），包括纳入适应性规划，并结合**第5.4节**中描述的各类互补系统和政治分析，以及我所说的更广泛的情景分析。这种情境分析包括对文化、关系和权力差异的分析，还可以利用诸如情境分析、社交网络分析和权力分析等工具。

